

民國七十一年三月

王陽明傳記
王陽明之教育思想
資料之十七

精 一 冊 美 金 十 三 元

發行人

： 朱

傳

譽

兼主編

出版者：天

一

出

版

社

社址：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六號三樓

電話：三〇一二八七三

郵政

： 一

〇

一

二

四

信箱

： 七

二

一

二

九

號

登記證：新聞局版台業字第〇〇五一號

王陽明傳記資料之十七

編號	篇名	作者	資料來源	頁次
王陽明之教育思想				
1	陽明先生之教育思想	孫沛德	女師專學報 n.2	1
2	王陽明的教育思想(上)	胡美琦	人生 v.12 n.8	11
3	王陽明的教育思想(中)	胡美琦	人生 v.12 n.9	13
4	王陽明的教育思想(下)	胡美琦	人生 v.12 n.10	15
5	陽明教育思想	鄧玉祥	師大教研所集刊 n.1	17
6	陽明知行哲學與教育思想	秦汝炎	師大教研所集刊 n.3	35
7	陽明心學及其教育思想	黃健中	師大學報 n.2	40
8	陽明先生的教育精神	羅香楨	中華日報	55
9	王陽明的「致良知」教育學說	伍振鰲	台灣教育輔導月刊 v.14 n.5	56
10	王陽明的教育方法(上)	胡美琦	民主評論 v.7 n.1	56
11	王陽明的教育方法(下)	胡美琦	民主評論 v.7 n.2	58
12	王陽明的人格、生活與教育事業	鄭繼孟	反攻 n.152	60

陽明先生之教育思想

孫沛德撰

黃宗羲明儒學案云：「有明學術，白沙開其端，至姚江而始大明，蓋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，未嘗及身理會，推見至隱，所謂此亦一述朱耳，彼亦一述朱耳，高忠憲云：『薛文清、呂涇野語錄中，皆無甚透悟，亦爲是也。』自姚江指點出良知，人人現在，一反觀而自得，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。故無姚江，則古來之學脈絕矣……」黃氏的論說，後世的人無以改移，程朱陸王，並稱於世，凡談論中國學術思想的，沒有不論及這四先生的成就的，而陽明先生最爲晚出，影響尤大，但是一般的學者，多推究陽明的哲學思想的影響和貢獻，却對他的教育思想，頗少研索，古人云：「泰山徧雨，河潤千里。」雖然陽明先生的思想，影響是非常的鉅大而深遠，遠及日本，近至當世，很多人都受陽明思想的涵育，而先生的成就，在文章、道德、事功上又是多方面的，然而先生可大可久之業，應首推教育講學，所以就先生的教學成就、教育哲學、教育思想、教育方法，推求闡述，雖止是大河的一支流，然啓示後學，爲現代教育，建立新的理論基礎，解決教育上的疑難，開悟教學方法，當是極具意義的事，所以不辭管窺蠡測之嫌，以明先生在教育上嘉惠後學之德，並就教於海內外的高明博雅。

一、教育事業

先生諱守仁，字伯安，浙江餘姚人，生於明成化八年，二十八歲舉進士，時邊地報緊，乃留心武事，凡兵家祕書，莫不精究，並於平居遊嬉的時候，以果核排列陣勢爲戲，復溺於辭章，欲以文章雄世，並有五年多的時間，從事於道家養生的學問，欲遺世入山，又講求釋禪，至中年才漸悟其非，先生三十四歲的時候，以當時的士人學者，專力於詞章記誦，乃倡導身心之學，勸人先立必爲聖人之志，於是聞者漸漸覺悟，願執贄於先生的門下爲弟子，乃專心致志於講學授徒，當時在京師的人士，以爲立異好名，大加非笑，而先生不以爲意。不久以上疏論救南京科道戴銑、薄彥微之冤，得罪當時的宦官劉瑾，受廷杖四十，遠謫爲貴州龍場驛驛丞，而結束了這段講學授徒的生涯，至龍場之後，四方的弟子益進，黃宗羲於浙中王門學案說：「姚江之學，自近而遠，其最初學者，不過郡邑之士。」顯然忽略了陽明的講學，始自京師的事實。

陽明先生困居龍場，始悟格物致知之理，謂「聖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。」並倡爲知行合一之說，於是門人大集，不久劉瑾伏誅，先生隱居後山，「無事民，無事官，無事父老，無事一身之事，母令萬辭。」由沒放至再回京師，已相隔六年

先生已四十歲，但仍不費講學授徒之功，其僚友方獻夫，爲吏部郎中，位在先生之上，因聞先生的講學，深自感悔，乃以師禮事先生，至先生四十一歲的那一年，因放陞南京太僕寺少卿，便道回家省親，遊於天台雁蕩間，入門請益的弟子甚多，即明儒學案所標的浙中王門學案，當發端於此時，所謂「姚江之教，自近而遠，其最初學者，不過郡邑之士耳。」即係指此，但去陽明最初的講學授徒，已近十年了。先生四十五歲的那一年，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，平漳州、樂昌、龍川、橫水、桶岡、大帽、潮頭等地的匪寇，於班師的時候，設立社學，並作訓蒙大意一文，以示當時的學官教誨劉伯頌等，揭舉蒙以養正的教育思想，實爲我國幼稚教學最完善的教學理論。先生於兵務軍機繁忙的時候，仍講學不輟，從先生求學的更多，以至「四方學者輻輳，始寓射圃，至不能容，乃脩濂溪書院以居之，」可見其盛況。陽明先生在江西最久，其後平定了宸濠之亂，兼任巡撫江西，從遊的弟子，甚有成就，成爲王學中的主流，誠如黃宗羲明儒學案江右王門學案所云：「姚江之學，惟江右爲得其傳，東廓、念菴、兩峯、雙江其選也，再傳而爲塘南思默，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意，是時越中流弊錯出，挾師說以杜學者之口，而江右獨能破之，陽明之道，賴以不墜，蓋陽明一生精神，俱在江右，亦其感應之理宜也。」這一時期所成就的學者，以後領導一方的，據學案所載有三十三人之多，真是盛極一時，當時的稽山書院，聚集八邑的才俊之士，有的來自湖廣，有的來自廣東，有的來自直隸、南贛、新建、泰和，一次環坐而聽講的達三百餘人。在先生五十五歲的時候，門人爲建陽明書院於越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，學者尊之爲陽明先生，實基於此。

五十六歲，先生以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，進征廣西田州岑猛，思恩盧蘇王受之亂，戎機倥傯，所至仍設社講學，門人從之者甚衆，有徐樾自貴溪追先生至餘干，始登舟論學，於是而有王門南中學派，因爲第二年先生平服思田，襲破八寨斷藤峽之後，不久便去世了，這一學派雖受先生之教，有久暫的不同，但誦習傳播，至爲久遠廣大，黃宗羲南中王門學案有云：「南中之名王氏學者，陽明在時，王心齋、黃五岳、朱得之、戚南元、周道通、馮南江其著也。陽明歿後，緒山、龍谿，所在講學，於是涇縣有水西會，寧國有同善會，江陰有君山會，貴池有光岳會，太平有九龍會，廣德有復初會，江北有南譙精舍，新安有程氏世廟會，泰州有心齋講堂，幾乎比戶可封矣。」可見南中王門之學，聲勢之浩大，影響之普及了。

以上三大學派，都是陽明自三十四歲至五十七歲二十三年之間，講學授徒的成績，此外先生的學生尚有散佈在楚中、北方、粵、閩的。先生死後，奉祀的精舍，紀念的書院，幾遍於各地，雖然是先生的大功大德，深入人心，但在實際上是先生教育上的成就，擴大了這些影響，先生的門人弟子，四出播揚先生的學說，弘揚先生的德教，使其學術思想上的影響，更在事功之上，此皆先生講學授徒的教育上的成績，有以致之，而且在事功上，在立德立言方面，有很多古人可以媲美先生，但在教育事業的成就上，和思想的影響上，可以和先生比肩的，並不多見，除了孔子之外，傳世的大儒如馬融的絳帳，爲人所傳誦的只是前列生徒後列女樂的韻

事，鄭玄只是註疏上的成就，朱熹雖云博大，但同時有陸象山抗不爲之下，所以愈益顯得先生在教育上成就的特出了。

二、教育哲學

杜威博士在中國演講平民主義與教育問題時曾說過：「教育哲學之正當的功用之了解爲教育上一要事，有時教育哲學爲人視爲無足重輕，因其與學校教授及管理之實際的工作上其間相去甚遠，但亦間或有人幾以之可爲具體的問題智識之替代物！」雖然教育哲學這一名詞係近代的產物，但這一事實和思想，實已淵源甚早，因爲近代教育哲學上的問題，如教育的主動與被動，教育上的激進和保守，道德與科學，個性與羣性，自由與法紀，甚至專才與通才，這些事實與問題，早已存在了，或已發生了！陽明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，而且畢生的時間，差不多全無間斷地用之教學，他的哲學，尤其是有關於教育方面的哲學思想，是有其特出的價值的，茲綜述如下：

一、學無內外，惟主精一：陽明以前的學者，常將德育智育分作二事，認爲係二個不同的範疇，而且認爲學習的進行上也有二部分，講習討論，認爲是外發的，認爲是被動的，反觀內省，認爲是內在的，主動的。於是認爲正心誠意是一事，格物致知是一事，正心誠意是德育的範疇，格物致知是智育的範疇，朱子雖欲合德育智育爲一，而他的入手方法，却是由格物致知以達正心誠意，所以先道問學而後尊德行，顯然仍把德育與智育看作二件事，陽明於傳習錄中却說：

「若語其要，則脩身二字亦足矣！何必又言正心，正心二字亦足矣，何必又言誠意，誠意二字亦足矣，何必又言致知，又言格物，惟其工夫之詳密，而要之只是一事，此所以爲精一之學，此正不可不思者也。」

陽明顯然是主張無德、智之分，德、智只是一件事，所以又說：

「夫正心誠意，致知格物，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，其所用力，實可見之地，故格物者，格其心之物也，格其意之物也，格其知之物也。正心者，正其物之心也，誠意者，誠其物之意也，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，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，理一而已，以其理之凝聚而言，則謂之性，以凝聚之主宰而言，則謂之心，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，則謂之意，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，則謂之知，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，則謂之物，故就事而言，謂之格，就知而言，謂之致，就意而言，謂之誠，就心而言謂之正，正者正此也，誠者誠此也，致者，致此也，格者格此也，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，天下無性外之理，無性外之物。」

陽明認爲理統德智，理是抽象的，無形迹可尋的，而其所聚凝所顯現則在於性，然則性亦具德智，所以才說「無性外之理，無性外之物。」故德智只是一事，求學亦是一事，求明其理，理一而已故曰一，理有至當故曰中，學無內德外智之分，惟求精一而已

。因爲「理無內外，性無內外。」故學亦無內外。傳習錄云：

「夫理無內外，故學無內外，講習討論，未嘗非內也，反觀內省，未嘗遺外也，夫謂學必資於外求，是以己性爲有外也，是義外也，用智也。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，是以己性爲有內也，是有我也，自私者也，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，故曰精義入神，以致用也，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，性之德也，合內外之道也。」

陽明這種不分德智，德智一體，求學無內省外觀之別，在教育哲學上，是很特出的，豈得深思求索，予以適當的評估的。

二、學在以爲聖人：荀子勸學篇云：「古之學者爲己。今之學者爲人。」爲己乃以成就自己，爲人在炫耀要譽於他人，其他傳統的學者，以爲學在行道利他，然而陽明則認爲學的目的在學爲聖人，陽明於贈林以吉歸省序云：

「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，殆以志之弗立歟，天下之人，志輪而輪焉，志喪而喪焉，志巫醫而巫醫焉，志其事而弗成者，吾未之見也，輪喪巫醫遍天下，求聖人之學者，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，爲其事之難歟，亦其志之難歟，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，吾亦未之見也，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，余曰：『子靈論子之志乎，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。』……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，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，已而舊習牽焉，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，已而外議奪焉，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……」

陽明勉弟子以學聖人爲志向爲目的，並說明世人不敢以學聖人爲志向，是把聖人看的太高，自己氣餒而不敢希求，爲他議所阻，終至不敢以聖人自期。然而聖人並非天縱，亦係人爲，可求而得，可學而至，陽明示弟立志說云：

「故程子曰：『有求爲聖人之志，然後可與共學，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，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者，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，聖人之所以爲聖人，惟其以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，則我之欲爲聖人，亦惟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，務去人欲而存天理，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，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，則必正諸先覺，考諸古訓，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，然後可得而講，而亦有不啻已矣。』」

正諸先覺，考諸古訓，卽道問學之事，而其目的，在求去人欲存天理之方法，以便上而爲聖人，以爲聖人之目的，則凡所謂學問之功者，然後可得而講，反面的意思，就是去爲聖人，則學問之功，無講求之必要。學爲聖人，因才智本質的不同，而有學、利、安、困之別，陽明答黃宗賢，應原忠書云：

「聖人之心，纖翳自無所容，自不消磨刮，若常人之心，如斑垢駁雜之鏡，須痛加刮磨一番，盡去其駁蝕，然後纖塵卽見，纖拂便去，亦不自消費力，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！若駁雜未去其間，固有一點明處，塵埃之落，固亦見得，亦纔拂便去，至於堆積

於駁蝕之上，終弗之能見也，此學、利、固、勉之所由異。」

人之稟賦有上智、賢、愚、庸、劣之不同，則或學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困而行之，或勉強而行之，都無害於爲聖人。人的才智有高下的不同，聖人亦有程度上的差別，傳習錄云：

「聖人之所以爲聖，只是其心純乎天理，而無人欲之雜，猶精金之所以爲精，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，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，而無人欲之雜，猶精金之所以爲精，然聖人之才力，亦有大小不同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，堯舜猶萬鎰，文王孔子有九千鎰，湯禹武王猶七八千鎰，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，才力不同，而純乎天理則同，皆可謂之聖人，猶分兩雖不同，而足色則同，皆可謂之精金，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，其足色同也，以夷尹而廁之堯孔之間，其純乎天理同也，蓋所以爲精金者，在足色，而不在分兩，所以爲聖人者，在純乎天理，而不在才力也。故雖凡人，而肯爲學，使此心純乎天理，則亦可以爲聖人，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，分兩雖懸絕，而其到足色處，可以無愧，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，學者學聖人，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……人之氣質，清濁粹駁，有中人以上，中人以下，其於道有生知安行，學知利行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，人十己千，及其成功則一，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，却專去智識才能上求聖人，以爲聖人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，我須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，逐一理會始得，故不務存天理上着工夫，徒弊精竭力……」

陽明將孟子人皆可以爲堯舜的道理和方法，比喻解說得如此的清楚而恰切。人皆可以爲聖人，學者必立志爲聖人，以學聖人爲目的，既以學聖人爲目的，則消極方面，必能成己，如荀子所說的，古之學者爲己，也必能利他濟衆，因爲開物成務，博施濟衆，正是千古聖者之所同，能如是，則教育目的上的爲己或爲人，利己或利他，自不再成爲爭論的問題了。如陽明在傳習錄中所說：「夫人者，天地之心，天地萬物，本吾一體者也，生民之困苦荼毒，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？」其境界實已包融了利己利他而上之。

三、致良知的教育哲學：陽明早年立志爲聖賢，崇奉朱子之學，由格物致知，以達明理見性，但是外物紛繁，物不勝格，知不可致，朱子的格物致知，已落於訓詁名物考求的老路，而以道問學爲格物致知，陸象山已譏朱子之學爲支離破碎，陽明二十一歲的時候，走的就是朱子格物之學的老路，據年譜所載：

「先生始作龍山公子京師，偏求考亭遺書讀之，一日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粗，一草一木皆涵至理，官署中多竹，即取竹格之，沉思其理不得，遂遇疾，先生自委聖賢有分，乃隨世就辭章之學。」

陽明循朱子的主張，以盡格物致知之功，他一方面發現物難格而知難致，其後又從另一方面回到朱子的主張已到物理與吾心

爲二，如黃宗羲姚江學案所記：「先生之學，始泛濫於詞章，繼而偏讀孝亭之書，循序格物，顧物理吾心，終判爲二，無所得入。陽明至被謫放至貴陽的龍場驛時，澄心靜坐，始恍然大悟，年譜記載云：

「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，蛇虺蠱毒瘴癘與居，夷人缺舌難語，可通語者惟中土亡命……因念聖人處此，更有何道，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，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，不覺呼躍，從者皆驚，始知聖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。」陽明既悟聖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乃反求理於事物的外求路徑，而還求之於內心本性，乃倡爲致良知之說，首先他指出朱子講格物致知外求之失，傳習錄說：

「朱子所謂格物云者，在即物而窮其理也，即物窮理，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，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，析心與理而爲二矣，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，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，求孝之理於其親，則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邪，抑果在於親之心邪，假而果在於親之心，則親沒之後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……夫析心與理而爲二，此告子義外之說，孟子之所深闢也，務外遺內，博而寡要……」

陽明的譬說，也許不足以服朱派的學者，並比朱子之說與告子義外之外相同，亦有未盡是處，但「務外遺內」，「博而寡要」的批評，恰深中了朱學的弊病。然而格物致知，語出大學，爲儒家之學的綱領，自然無法推翻，陽明乃予以新的詮釋，傳習錄云：「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，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，吾心之良知，即謂天理也，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，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，致吾心之良知者，致知也，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，格物也，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，合心與理而爲一，則凡區區前之所云，與朱子晚年之論，皆可不言而喻。」

陽明認爲在以我觀物的立場，提出了心即理，以我觀物，即以心之理，推物之理，頗偏失於唯心論，但這一段說法，不過爲格物致知翻案，以便建立其哲學系統而已，致良知的真義，他於大學問中有較明確的解釋：

「致知云者，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，致吾心之良知焉耳，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者也，是非之心，不待慮而知，不待學而能，是乃天命之性，吾心之本體，自然靈明覺者也，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不自知者，其善歟，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，其不善歟，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，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。」

至於致良知與格物之間的關係，陽明亦力加說明，以破學者之惑，大學問云：

「致知必在於格物，物者事也，凡意之所發，必有其事，意所在之事，謂之物，格者正也，正其不正，以歸於正之謂也，夫是之謂格。……良知所知之事，雖誠欲好之矣，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，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，良

知所知之惡，雖誠欲惡之矣，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，則是物有未格，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。」陽明所謂格物，並非如朱子所說的即物窮理，而是以良知格正對於事物的好惡，以個人的主觀體認加之於事物，而非以客觀的觀察徵驗，以了解外在的事物，所以才說「心外無理」、「心外無事」，於是才主張德智一體，惟在求其精一，爲學無內省外觀之分。故陽明云「致知之外更無學。」

陽明確信人人有良知，人人能致其良知，則人人能爲聖人，其書朱守乾卷云：

「夫良知者，即所謂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不待學而有，不待慮而得者，人孰無是良知乎，獨有不能致之耳，自聖人以致於愚人，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，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，是謂天下之大本也。致良知而行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。」

「致良知」則天理明，人慾去，如是則優入聖域，人人有良知，人人可致良知，則人人可爲聖人，陽明於他致良知的思想，信之最篤，而行之最切，然而陽明以後的學者，仍落於空疏玄談，誠如明儒學案所云：「自姚江指出良知，人人現在，一反觀而自得，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，故無姚江，則古來之學脈絕矣，然致良知一語，發自晚年，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，後來門下，各以意見攙和，說玄說妙，幾同射覆，非復立言之本意矣。」黃宗羲氏認爲其弊不在陽明，實可確信。今天由於科學的急速進步，德對與智育分離日遠，人文科學的研究又失去應有的地位，得陽明的致良知說而省思之，方不致逐物不返，使人成爲物質文明的奴隸。對於教育哲學的貢獻，當非淺短。

四、知行合一的教育哲學：陽明以前的學者，大多將知行分作兩件事，傅悅「知之非艱，行之維艱」之說，更深入人心，至陽明乃倡知行合一之說，傳習錄云：

「某嘗說知是行的主義，行是知的功夫，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，若會得時，只說一箇知，已自有行在，只說一箇行，已自有知在，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，又說一箇行者，只爲世間有一種人，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，完全不解思惟省察，也只是箇冥行妄作，所以必說個知，方纔行得是。又有一種人，茫茫蕩蕩，懸空去思索，全不肯着實躬行，也只是箇揣摸影響，所以必說箇行，方纔知得真……今人却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，以爲必先知了，然後能行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，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，故遂終身不行，亦遂終身不知，此不是小病痛，其來非一日矣。」

「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，」陽明以此建立了他的知行合一的學說思想：他的致良知之說，雖爲晚出，但與此毫不矛盾，知行之理，有陽明的闡說而大明，傳習錄云：

「知之真切篤實處，即是行，行之明覺精察處，即是知，知行工夫，本不可離，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，失却知行本體，故有合一並進之說，真知即所以爲行，不行不足謂之知。」

又文錄答友人書云：

「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，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，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，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，便不要真切篤實也，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，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，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，便不要明覺精察也。知天地之化育，心體原是如此。」

陽明可以說已將知行的精義闡發無餘了，然而影響中國教育思想和治學方法的，無過於中庸上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的一段話，陽明將知行合一的哲學，予以新的詮釋，在教育思想上，實是一大貢獻，其與友人書云：

「凡謂之行者，只是着實去做這件事，若著實做學問思辨的功夫，則學問思辨亦是行矣，學是學做這件事，問是問做這件事，思辨是思辨這件事，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矣，若謂學問思辨之後然後去行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，得行時又如何去得箇學問思辨的事。」

傳習錄有云：

「蓋學之不能以無疑，則有問，問即學也，即行也，又不能無疑，則有思，思即學也，即行也，又不能無疑，則有辨，辨即學也，即行也，辨既明矣，思既慎矣，問既審矣，學既能矣，又從而不息其功焉，斯之謂篤行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。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，謂之學，以求解其惑而言，謂之問，以求通其理而言，謂之思，以求精其察而言，謂之辨，以求履其實而言，謂之行，蓋析其功而言，則有五，合其事而言，則一而已，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，知行並進之功，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，正在於是。」

陽明這一段話把爲學的歷程說得再透闢也沒有，世人只略略耳食其知行合一之說，而忽略了他知行合一之說的真義，更不去研究知行合一與教育上的關係，實在有負前哲的立言垂訓的苦心，他雖於教育方面沒有提出重實驗、重觀察，及實物研究，但確已包括了這些精義，而且凌駕杜威氏的實驗主義而上之，因爲在杜威的教育哲學中，所首先注重的是教育上的知識任務與性質，人類的思想知識只是用來作解決問題，應付環境的工具，而且只是偏重於現實界，而陽明由致良知及知行合一，則注重於整個人的完成，這一點值得我們深思比較。

我們現行的教育，德育智育之間，缺乏必需的聯繫，由於科學的急速發展，更大有輕德育而偏重智育之勢，人類倫理道德的觀

念，趨於墮落，人幾乎成爲科學物質文明的奴隸，教育已偏向於爲工具之學而致力，知行之間，學用之間，距離日遠，得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以正之，致良知之說以救之，學爲聖人，學主精一以成之，對時下的弊病，痛下鍼砭，當是負教育之責的人，所應靜心求索的，使教育不致有偏失，教育的目的不致落空，教育的結果不致於否定人之所以爲人，則國家之幸，更是後世子孫之幸。

三、教育思想

一、蒙以養正：明代的政治，至憲宗武宗之際，實已腐化朽敗，天子不親政事，大權落於宦官之手，小人朋比爲黨，正人君子不能安於其位，州郡之間，有藩王的割據，流寇的殘暴，民不聊生，陽明在討除流寇、平定宸濠之亂的時候，費了很多氣力，但所至之處，於民困未蘇，諸事待興之時，他所急於從事的，就是興辦社學，殷殷勸告士民，教育勸導其子弟，納之正途，而且他特別注重幼穉教育，陽明於平定贛南之寇後，特設立社學，年譜記其事云：

「先生謂民風不善，由於教化未明，今幸盜賊稍平，民困漸蘇，一應移風易俗之事，雖未能盡舉，姑就其淺近易行者開導訓誨，卽行告諭發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，互相戒勸，興立社學，延師教子，歌詩習禮，出入街衢，官長至，俱叉手拱立，先生或贊賞訓誘之，久之市民亦知冠服，朝夕歌聲，達於委巷，雍雍然漸成禮讓之俗矣。」

可見陽明在這方面的成就，其幼稚教育——蒙以養正的思想，也在此時揭示於世，他以訓蒙大意示當時的學官教讀劉伯頌等，首先宣示了幼稚教育的宗旨。訓蒙大意云：

「古之教者，教以人倫，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，而先王之教亡，今教童子，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。」

陽明這種主張，在以獵取科名，以爲陞官得祿之階的社會環境裏，已是一重大改革，其教育兒童的宗旨，表面看來太注重德育，但其教學內容，都是德智並重的，訓蒙大意云：

「其栽培涵養之方，則宜誘之歌詩，以發其志意，導之習禮，以肅其威儀，諷之讀書，以開其知覺！凡誘之歌詩者，非但發其意志而已，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也，宜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；導之習禮者，非但肅其威儀而已，亦所以周旋揖讓，而動其血脈，拜起屈伸，而固束其筋骸也，諷之讀書者，非但開其知覺而已，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，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。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，調理其性情，潛消其鄙吝，默化其粗頑，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，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，是謂先生立教之微意也。」

陽明這種兒童教育的主張，其精神與現在的幼稚教育的理論，甚爲相合，其着眼之遠大，與境界之高超，且有超越之處，正

於現代幼稚教育之父——福祿貝爾(Froebel 1782—1852 A.D.) 已逝世十五年之久。陽明真是時代的先驅，其時兒童教育的實況，與他所懸的理想，正背道而馳，訓蒙大意云：

「若近世之訓蒙者，日惟督以句讀課做，責其檢束，而不知導之以禮，求其聰明，而不知養之以善，鞭撻繩縛，若待拘囚，彼視學舍如囹圄而不肯入，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，竊避掩覆，以遂其嬉遊，設詐飾詭，以肆其頑鄙，偷薄庸劣，日趨下流，是蓋馴之於惡而求其為善也，何可得乎。」

當時兒童教育情況的惡劣，與陽明所宣示的高遠目標，成為極鮮明的對比，他所舉說的弊病，今日尚有參考改進的價值。陽明的兒童教育的主張，是有其理論的根據的，乃是順着兒童的性向發展，予以啓示和鼓勵，引發其善心善性，以達到蒙以養正的目的。訓蒙大意云：

「大抵童子之情，樂嬉遊而憚拘檢，如草木之始萌芽，舒暢之則條達，摧撓之則衰痿，今教童子，必使其趨向鼓舞，中心喜悅，則其進自不能已，譬之時雨春風，霑被卉木，莫不萌動發越，自然日長月化，若冰霜剝落，則生意蕭索，日就枯槁矣。」

陽明復於教約中，提出了兒童教育科目的規定，在德育上每日考察兒童在家中的行為，是否孝順父母，恭敬長上，無缺溫情定省的禮節，來往道上，步趨禮節，是否放蕩，言行心術，是否欺妄，在生活行為上考察完畢，方能就席讀書，在課業上有歌詩、習禮、授書、歌詩，要求容止安定，清朗其聲音，均審其節調，每日分一班輪流歌詩，至第五日則總四班互相觀摩演習，與今日的生活與倫理無別。習禮在使學童澄心肅感，審其儀節，廣其容止，每一日一班演習行禮，每十日則總四班互相觀摩演習，與今日的生活與倫理，已頗近似，惟今日的生活與倫理，仍側重於理論，而未曾實習演練，以視陽明之習禮，尚有遜色，至於正式的課業，授書則不在多，而求其精熟，每日能二百字的，止可授一百字，使學童精神力量有餘，使「無厭苦之患，而有自得之美。」用這樣的方法和教材來教導學童，在當時是革新的、進步的教育，可見陽明的偉大。

陽明對兒童心理性的了解，實甚透關，所以他提出的兒童教育主張，乃能一反流俗，卓然為時代的先驅。至於教材上的主張，雖不合於今日，乃是時代環境的關係，蒙以養正，啓蒙的教育，乃在養成兒童心性之正，這一理論性的口號，足以流傳不朽，萬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至少是中國童稚教育上的偉大人物，譽之為中國的福祿貝爾，實在是委屈了陽明先生。因為他的理論的提出，早於福祿貝爾已甚多。只是陽明未將學童的入學年齡降至幼穉的階段而已。

二、熱情鼓舞：陽明在教育思想有一特出之點，就是教育者對於受教者，主張以熱情鼓舞，使受教者感發興起，師生之間，日益投合，受教者自然為學日進，慕道益切了。其寄希淵書云：

「顧今之時，人心陷溺已久，得一善人，惟恐其無成，期與諸君，共明此學，固不以自任爲嫌而避之，譬之婚姻，聊爲諸君之媒妁而已，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，卽與接引，此本分內事，勿謂不暇也。」

陽明這種惟恐人才淪落，及感於人才之難覓，而亟欲作育之，使之有成，這種熱忱，躍然紙上，「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，卽與接引。」而造就人才的目的，是共明聖學，其胸襟，其熱忱，是何等的感人。其與李道夫云：

「學絕道喪，倍之陷溺，如人在大海波濤中，且須援之登岸，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，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之中，是適重其溺，彼將不以爲德，而反以爲尤矣。故凡居今之時，且須隨機導引，因事啓沃，寬心平氣以薰陶之，俟其感發興起，而後開之以其說，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，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爲君子愛人之累，不知尊意以爲如何？」

表面看來，似乎是陽明以此爲引接後進、沃啓學者的方法，其實是有絕大的熱忱，才能有如許耐心、才能如此設身處地，爲受教者着想，「隨機引導、因事啓沃」，實是不易，其答方淑賢書云：

「前輩之於後進，無不欲其入於善，則其規切砥礪之間，亦容有直情過當者，却恐後學未易承當得起，既不我德，反以我爲仇者有矣，往往無益而有損，故莫若且就其力量之所可及者，誘掖獎勸之。」

有唯恐後進不入於善之熱忱，才能設身處地，恐其無益反損，陽明之與後進，極盡熱忱鼓舞之能事，誠心接納，雖軍旅舟車之間，與學生講學不輟，信札往返，無不是關切鼓舞、決疑解惑之辭，他在出師遠征之際，猶不忘浙中書院的學生，及書院中的設施，其與錢德洪、王汝中書云：

「紹興書院中同志，不審近來意向如何，德洪、汝中既任其責，當能振作接引，有所興起，會講之約，但得不廢，其間縱有一、二懈弛者，亦可因此夾持，不致遂有傾倒，餘姚又得應元諸友，作興鼓舞，想益日異而月不同，老夫雖出山林，亦得以自慰。」

又云：

「書院規制，近聞頗加修葺，是亦可喜，寄去銀二十兩，補助工費牆垣之未堅完，及一應合整備者。」

諄諄囑咐，情溢於言，在陽明這種熱忱感召之下，於是弟子皆感發興起，有黃蘿石者，年已六十八，而且是一有名的詩人，一見陽明，盡棄其學，執贄強請爲弟子，陽明以師友之間待之，黃蘿石特爲之改名曰從吾道人，謂從吾之所好，以從陽明而樂也。又有黃夢星，奉父之命，從潮州不遠數千里從陽明學於浙中，數月之後，便一回家省親，去二、三月輒來，陽明勸他居家自學以免於長途奔走，黃夢星仍然以親仰陽明的風範，而不辭長途跋涉，陽明的一生事業，是花在政治上的功夫最大，而授徒講學，只是餘事。

，但在二十幾年之間，竟能發展成爲一個聲勢動天下，弟子遍南北的學派，考其原因，全是得力於他的熱忱鼓舞，所至之處，世之賢士君子，乃爭而歸於門下，禮記云：「師嚴然後道尊。」以後的老師，多以厲其威儀，尊其瞻視，使學生敬而畏之，陽明却以熱忱感召，故相處甚得，門人無拘檢之苦，年譜記其事云：

「中秋月白如晝，先生命侍者設席於碧霞池上，門人在侍者百餘人，酒半酣，歌聲動，久之，或投壺，或聚筭，或擊鼓，或泛舟，先生見諸生興劇，退而作詩，有鏗然舍瑟春風裏，點也雖狂得我情。」

陽明死後，門人聞訊而至，每日來弔者百餘人，靈柩發引，門人會葬者千餘人，麻衣衰縗，扶柩而哭，有自初喪至卒葬而不歸的，書院及諸寺院的講學聚會，仍繼續不輟，如陽明在世時一樣，此無他，是陽明付出了熱忱，才得到熱情的回報。所以教學不只是知識的傳授，辦教育的人而無汲引後進，鼓舞誘勸的熱忱，是達不到教育的目的，收不到教學的效果的，陽明的言行，是所有從事教育的人，共同的規範。

三、因材施教：有教無類，因材施教，是孔子的教育精神，後來的教育家，無不奉行不悖，但陽明在這一方面做得最成功，因爲他不但做到了因材施教，而且做到了因性成德，陽明送別王純甫掌教應天書院序云：

「曰：『剛柔淳漓之異質矣，而盡我之教，其可一乎？』曰：『不一所以一之也。天之於物也，巨細脩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，惟技也亦然，弓冶不相爲能而其足於用一也，匠斲也，陶埴也，圻埴也，其足以成室亦一也，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，各詣其巧矣，而同足於用。因人而施之教也，各成其材矣，而同歸於善，仲尼之答仁孝也，孟氏之貨色也，可以觀教矣。』曰：『然則教無定法乎，昔之辯者則何嚴也？』曰：『無定矣，而以之必天下，則弓焉而治廢，匠然而陶圻廢，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，然而質人人殊，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，是故或失則隘，或失則流矣，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，同歸於善者定法矣，因人而施質異也，同歸於善性同也，教以復其性而已，由堯舜而來，未之有改，而謂無定乎！』」

人的天性之中，就有齊同的本性，同於己的則以爲是，異於己的則以爲非，在施教者的天性裏，已有了這個偏向，有意或無意之間，希望學生上同於己，尤其現在的學校教育，在行爲管理、學業進修、成績考核方面，都訂有一定的標準，來施之於智愚不同、賦性不同的學生，雖屬無可奈何之事，但以陽明的教育思想來說，他承認教育有定法，有統一的標準，以同歸於善爲定法，以因材施教爲定法，他認爲此外尚有定法的話，則施之於智愚不同，賦性各異的受教者，必不能因材性之不同，而成就各類的專材，陽明於復顧東橋書中云：

「學校之中，惟以成德爲事，有長於禮樂，長於政教，長於水土播植者，則就其成德而使益精其能，迨夫舉德而任，則用之者惟

知同心一德，以共安天下之民，視才之稱否，而不以崇卑爲輕重，效用者亦忻知同心一德，以共安天下之民，苟當其能，則終身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，當是時，才質之下者，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，各勤其業，以相生相養，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。」

陽明所論的雖是三代的教養與用人，而實際是發抒他個人的培養人才的主張，有長於禮樂的，有長於政教的，有長於水土播種的，這是才性的不同，則就其成德而使益精其能，則是成就其專才，因才而作育之，這是他所謂因才成就的大意。

孔子曰：「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，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爲也。」孔子之所以有取於狷狂，是因爲狷狂可使進於道。荀子勸學篇云：「木就繩則直，」則完全是一種強力的矯制，以使受教者就其型範，而陽明則不然，他是主張因性成德的，傳習錄云：

「王汝中省曾侍坐，先生握扇命曰：『你們用扇。』省曾起對曰：『不敢！』先生曰：『聖人之學，不是這等細縛苦楚的，不是粧做道學的模樣，汝中曰：『觀仲尼與曾點言志一章，略見。』先生曰：『然！以此章觀之，聖人何等寬洪包含氣象，且爲師者問志於眾弟子，三子皆整頓以對，至於曾點飄飄然不看那三子在眼，自去鼓起瑟來，何等狂態，及至言志，又不對師之問目，都是狂言，設在伊川，或斥罵起來了。聖人乃復稱許他，何等氣象，聖人教人，不是箇束縛他通做一般，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，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，人之才氣如何得同。』」

陽明這種因性成德的主張，確是超絕，因爲受教育者雖是被雕塑，但是才性不同，有的是楊柳，有的是楠櫟，如何能一般地施以同樣的斧鑿手法呢？今天我們的教育，大過着眼於教材教法上、訓育管理上的求同，而沒有注意及學生材質性向上的差別，而予以不同的教育。學者的才性既有高下，施教者亦應隨之而有等差的教法，傳習錄云：

「問：『中人以下，不可語上，愚的人與之語上，尚且不進，況不與之語可乎？』先生曰：『不是聖人終不與語，聖人的心，憂不得人人都做聖人，只是人的資質不同，施教不可躐等，中人以下的人，便與他說性說命，他也不省得，須慢慢琢磨他起來。』」

性有智愚厚薄之分，施教有等級之別，不因不材而不教，斯乃有教無類，材性不同，教亦不同，斯之謂因材施教，性有不同，因性以成就之，此之謂因性成德，陽明的教育思想，最得孔子教人之風旨，且能發揚光大之。

四、精誠立本：陽明既認爲德智一體，求學無外體內省的分別，所以認爲德有本而學有要，精誠爲爲學立德之本，其紫陽書院集序云：

「子問之，德有本而學有要，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，高之而虛無，卑之而支離，終亦流蕩失宗，勞而無得矣！……譬之植焉，

心其根也，學也者其培植之者也，灌溉之者也，扶植而刪鋤之者也，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。」

德有本而學有要，本既立，要既得，益以學問思辨行之功，方不虛無支離。其贈林典卿歸省序云：

「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，辭於陽明子曰：『元敍嘗聞立誠於夫子矣，今茲歸，敢請益。』陽明子曰：『立誠』，曰『學固此乎？天地之大也……而曰立誠，立誠盡之矣乎！』陽明子曰：『立誠盡之矣！夫誠實理也，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，則其明焉者，則其行焉者，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誠也。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，則其羣焉者，則其分焉者，則其引類而言之，不可盡焉者，皆誠也。是故殫智慮，殫精力而莫究其緒也，靡晝夜，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，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奧也，夫誠一而已矣，故不可復有所益，益之是爲二也，二則僞矣，故誠不可益，不可益，故至誠無息。』」

陽明將立誠視爲德學之本，且係天地萬物知識之本，並予以哲學上的解釋。其送宗伯喬白巖序云：

「是故非專則不能精，非精則不能明，非明則不能以誠，故曰惟精惟一，精精也，專一也，精則明矣，明則誠矣，是故明精之爲也，誠一之基也，一天下之大本也，精天下之大用也。」

陽明以精爲天下之大用，誠爲天下之大本，學者能於精誠以立其本，則爲學之要、立德之本得矣，本要既得，體用兼參，則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相合矣！其他皆係枝節，可迎刃而解，陽明與王純甫書云：

「且純甫之意，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，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，若區區之意，則以明善爲誠身之功也，夫誠無妄者之謂，誠身之誠，則欲其無妄之謂，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，故博學者學此也，審問者問此也，慎思者思此也，明辨者辨此也，篤行者行此也，皆所以明善而爲誠之之功也，故誠身有道，明善者誠身之道也，不明乎善，不誠乎身矣，非明善之外，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，誠身之始，身猶未誠也，故謂之明善，明善之極則身誠矣，若謂自有明善之功，又有誠身之功，是離而二之也，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！」

陽明以誠貫通德智的領域，明善爲立誠之始，明善屬於智的範圍爲多，故主精，精以爲學之要，誠以爲德之本，學以明善，明善以立誠，這是陽明教育思想的精要之處，與其致良知，知行合一的教育哲學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。

四、教學方法

陽明在剿匪從政的餘暇而講學，四方的學者爭相歸之，形成一個大的學派，影響深長，考其原因，除了他事功上的影響，思想上的沃啓，人格上的感召之外，要歸功於他的教學方法。他的教條示龍場諸生云：

8

此為試讀，需要完整PDF請訪問：www.ertongbook.com